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2

明代的变迁

赵轶峰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2

明代的变迁

赵轶峰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的变迁 / 赵轶峰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3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 王晋新主编)

ISBN 978 - 7 - 5426 - 2740 - 7

I. 明… II. 赵…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明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433 号

明代的变迁

著 者 / 赵轶峰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60 千字

印 张 / 23

ISBN 978 - 7 - 5426 - 2740 - 7/K · 120

定价: 39.00 元

序

南炳文

赵轶峰先生是当前明清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之一。近年来有幸与他多有来往,也断断续续读过他的一些大作,受益良多。他给我的印象是睿智而稳重,知识渊博,见解深刻。每逢讨论学术的场合,大家都愿意听到他的发言。其发言语速不紧不慢,从容镇定,娓娓道来,以思路清晰开阔、内容清新独到而令人全神贯注。近日有幸读到 he 已整理完毕、即将正式出版的明史研究论文集《明代的变迁》,更加深了我对这位学者的了解。极度的兴奋,使我拿起笔来,写下肤浅的感受,一以祝贺这部明史研究新硕果的问世,一以向学术界郑重推荐,期望与大家共同体味其心得,分享其贡献。

《明代的变迁》收录了作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有关明史的研究性论文 19 篇,另外还有以上论文结集在一起后所写的导言和结论各 1 篇,共 21 篇。这部论文集将作者有关明史的重要论文大体收集在了一起,为读者了解作者有关明史的研究成果和见解提供了方便。粗读一遍后,我感到这本书至少有如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内容丰富,广泛探讨了明代历史许多领域的学术问题。本书除导言和结论外的 19 篇学术论文,按照其内容共分五大部分。一部分探讨关于国家制度方面的问题,包括宗教管理、国家祭祀以及内阁票拟制度等;一部分探讨晚明知识分子与社会结构问题,包括山人状况,知识分子之道德沉沦感和黄宗羲的思想等;一部分探讨了下层社会生活问题,包括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民

众价值观和多元宗教信仰,以及悍妻、多妾现象等;一部分探讨货币制度与财政危机问题,包括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明末财政危机的时代特征等;一部分探讨明清之际的历史趋势问题,包括以文明史观对明清之际的历史趋势进行解读以及对中國史学界使用的内涵不同的三个“封建”概念进行分析等。五大部分,涉及面极其广泛,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生活,从精英人士到下层民众,从静态关照到动态研究,面面俱到,其可谓洋洋大观。这使读者犹如看到关于明代历史的一座立体群雕园,又犹如欣赏关于明代历史的一部以专题为序的电影纪录片,大开眼界,收获极丰。

二、中心明确,重视宏观把握。本书所收论文,涉及的领域虽然很多,但对于诸多领域的探讨却有一个从宏观角度把握明代历史的共同中心将之联系起来。这个中心便是明清历史的基本趋势。如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的关于明代货币和明末财政危机的研究,在于思考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程度和方式。通过考察,作者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发展到明代,明显地开始了自身的转型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这一运动的突出表现”,但是“十六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发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断语所能概括的。对于明末财政危机的考察使我们知道,即使从静态角度观察,不仅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国家上层建筑结构也处于振荡和局部改组中。从社会再生产的运转过程来考察,不仅生产环节产生了变化,流通与分配环节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连整个再生产过程都具有了新的特征。我们所以把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称为一种‘过程’而不是‘现象’,就是因为它是中国传统文明典型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振荡”。又如作者约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完成的关于晚明知识分子与社会结构的研究,都是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内在特质与社会转型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为着眼点的。通过探讨作者指出:“有近代社会因素意义的某些‘萌芽’产生,到近代化发展成为主要的历史趋势,需要人的精神解放作为前导,然后经过一段培养积蓄——科学、文化、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改造,才会

形成连续性的历史进程。这种精神解放首先需是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识转变……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或者某些哲学命题上提出一些有启蒙思潮色彩的新见,都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面前逡巡不前,而伦理道德又恰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融通整体的精神内核。这是培养秩序、一统、淳朴观念的沃土,造成了极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也是生长自由、民主、竞争观念的瘠壤,使中国难以借诸发达的历史文明率先进入近代历史进程。”“近年的许多关于传统文化之现代转变或者现代意义的研究多瞩目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中坚角色,若以明末而言,这些人毕竟还少普通繁荣危机入伏时代所需的含敛的理性精神而过多地倾向于情感世界。儒家的人生观,较少超越的理性而多入世的激情。这在繁荣的时代,易流于奢侈,在危机的时代,易染末世的风情。这种品格,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也还每每表现出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作为的一个障碍。”再如作者约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至21世纪初完成的关于17世纪前后中国下层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考察了这种状况与社会变动的关系。通过分析作者指出,“下层民众的伦理观念体系与近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之间并没有任何严重的障碍,而儒家思想与商业伦理之间反而存在严重的紧张。对于下层民众说来,卷入商业活动只是条件问题,而对于严肃的儒家人物则是自我变异的问题”。“17世纪前后中国的信仰世界就显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与成长的初期相比带有根本性的差别。流行的关于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关联的种种理论,都是从一个社会体系中某一特定宗教或宗教派别的精神着眼的,而17世纪前后中国的宗教、信仰世界都是多元的和兼容性的。它不可能成为西式商业资本主义的积极条件,同时也未必构成一般商业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的道路,肯定是特殊的”。另如作者在最近一两年开始进行的关于明清之际的历史趋势的总体宏观性直接研究,更是以讨论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说为契机,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直截了当地专门分析了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问题。作者指出:“14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明朝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时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都还是区域性的。”“中国15世

纪举行的从东亚到非洲东海岸的多次对于当时说来极为遥远的探险,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这个世界上存在任何严重的、即使是潜在的挑战的印象。这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管理着巨大地理空间的中国政府更加倾向保持传统的内向的、关注生存的方针……在稍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群体总体上忽略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18世纪的中国则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个成就和15世纪的远洋探险一样带来的是新的安全感和对重大外部世界的忽略……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鸦片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以及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更尖锐起来的国内矛盾。这时候,中国人除了学习西方别无选择。在学习西方、改造自己的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生存方式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大体是在重新组织国家体系方面倾注了最大的力量。清朝的结束也是中国文明‘现代化’的一次嬗变。中国虽然失去了按照自己的传统逻辑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使那种情景的具体情状成为了永远的谜,但是还是保持了较多的往日的遗产和民族的特色。”当作者写下上述一段论述之时,其对秦至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的看法,已改变了20世纪将之视为封建社会的观点,从而在这里,也就不再称明清时期为封建社会的后期,关于其社会变迁的论述,也便不再出现与之相关的内容和概念,与作者在20世纪所写的有关论文存在差别。但其紧紧抓住明清历史的基本趋势这个中心展开论述,则丝毫没有更改。作者在研究明史中这种中心明确,重视宏观把握的角度和方法,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它使作者能够沿着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线索不间断地持久研究下去,从而收到从本质上把握有明一代历史、形成体系性见解的效果,也能收到纲举目张的益处,带动许多具体领域的探讨,弄清其方方面面的情景和前后嬗变之迹。

三、广泛收集和深入分析原始资料,重视搞清历史真相。本书所收论文,绝大多数实证性很强,从而大大增强了作者论点的说服力。而其提出的实证,是在广泛收集、深入分析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其所使用的史料,作者都进行过严格的审察,力求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不容许存在丝毫的误解和虚假成分。如太倉

是明朝的中央国库,专司货币为形式的国家收支,其活动反映着明朝国家财政的平衡状况,因此其收支数字意义重大。有两位前辈学者曾对之进行过专门研究,做出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该库明中叶后岁入与岁出的银数表,是很大的贡献。但其中存有错误。本书作者在研究明末财政危机时,就广泛查阅明实录、明人文集等有关史籍,对此表所列数字进行认真核对,发现了其中七大类错误,写出了本书所收的《明后期太仓收支数字考》一文。这样的细致核查,使作者对明后期财政状况的分析,建立在了相当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又如日本一位很有影响的学者对明初的城隍祭祀作过专门的研究,提出明初国家城隍祭祀制度与民间城隍信仰是相互对立的,国家城隍祭祀制度一开始即未能实行,而且围绕这个问题曾发生严肃的政治派别斗争。本书作者详细查考、分析了有关的原始文献记载,找出了历史的真相,专文指出明初城隍祭祀制度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并非在两派斗争中产生,而且有关制度内容颇得实行,明初民间城隍祭祀和国家祭祀方式并无不同,其差别是后来发生的,从而证明这位日本学者的主张是错误的,纠正了其关于明初国家制度与社会关系的误解。

四、多有创见,推动了明史研究水平的提高。本书中所收论文,无不是创新之作,或者论述前人未曾涉及的新课题,或者对前人已论述过的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补正缺失,抒其新见。作者的深刻见解俯拾即是。诸如指出明代官方宗教祭祀活动的着眼点在于治民,民间祭祀的着眼点在于悦神祈佑;指出明代票拟情况的变化,相应地反映出内阁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指出明代,尤其是晚明,国家对于社会成员行为的实际控制力其实相当微弱,晚明社会应该是个人的自由度相当大的社会;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下层的伦理价值观念虽然不能不受到官方倡导的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从来也没有和精英们保持一致;指出历史上所有成文的规范都是为了否定和约束人们的某种行为,它的反面可能具有很大的社会真实性。……这些随手从书中摘取的论点,哪个不是入木三分、令人点头称是!本书的结论部分讲到明代的变迁时,提出了“新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的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的简单化”、

“市民文化的活跃”、“人口爆炸”、“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儒学的社会化”等七个方面,这种提法全面而扼要地反映了影响重大的明代历史的本质性新变化,既是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也科学地总结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更引人注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明史研究的新水平。

上述之外,本书的优点和特点还有很多,篇幅的限制,不能一一提出。而仅仅以上所述优点和特点,即可充分说明《明代的变迁》实为当前关于明史研究的重大收获。作者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我认为原因起码有如下三条。

一是受其业师一代史学宗师李洵先生的影响。赵轶峰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曾师从李洵先生学习明清史。李洵先生之研究明清史,其重要的特点正是重视宏观体系性地把握与广泛收集、深入分析原始资料、追求历史真相两方面的结合。《明代的变迁》一书之具有这两个特点,乃作者对李洵先生治学方法、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作者自己就曾说过:“李(洵)先生为明清断代史家,其学重基本史料之精细研究,无论课题大小,多从宏阔处着眼,不以依赖独占难得资料为胜。此道对我影响很大。”(《学史丛录》自序,中华书局2005年1月出版)

二是吸收了中外史学界治学的宝贵经验。赵轶峰先生在从李洵先生完成硕士阶段学习之后,又出国到加拿大埃爾伯塔大学师从Brain Evans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并曾执教于加拿大布兰登大学和埃爾伯塔大学,前后在国外生活十年,才又回到国内。这样的经历,使之有机会将中国与外国史学家治学的经验、方法统统接触、细细品味比较,而后择其精华,融会中外,形成其高出常人一等的治学角度和思路。在《明代的变迁》一书中,随处可看出其对国内外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皆极为熟悉,既了解其优长,又洞悉其局限,从而在分析明代的历史问题时,总是能够得心应手地选用最为适宜的理论和方法,使其研究取得理想的进展。

三是治学领域宽广,眼界开阔。赵轶峰先生在明清史领域有独到造诣,除了本集所收论文以外,他撰写的《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也即将出版。另外,他与赵毅先生合作主编过

《中国古代史》，曾经主译《全球文明史》，甚至撰写了《克林顿总统弹劾案与美国政治文化》一书，涉足了政治、法律和文化多个领域。他对史学理论也下过很大功夫，专门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特别钻研过史学方法论，其学术论文集《学史丛录》中就收有其有关文章 15 篇及其他领域的论文多篇。宽广的知识结构，自然使他的学术研究得以左右逢源，高瞻远瞩，洞察本质，见解独到。

从包括《明代的变迁》在内的赵轶峰先生的学术论著看，约在开始进入 21 世纪后，赵先生已不再用封建社会称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改为有时称其为“郡县——官僚社会”，有时又称为“帝制农商社会”（起码如此称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在帝制框架前提下，在向农商为基础的商业化社会渐渐演变”。只是正式结论尚未最后肯定，更未详细地加以论证。他自己直率地称其目前的提法“还远不成熟”。而社会性质如何是研究历史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对于把握相关时代的历史特点进而正确理解其他相关的具体历史事项极为重要。因此，笔者企盼着赵轶峰先生能尽早就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形态，做进一步研究，给其一个经过充分论证的确定的概念。史、论、中、外兼长的赵轶峰先生是史学界同仁中有能力从事与完成这一项任务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相信他能够满足笔者愿望。当他完成这一任务之时，不管其结论如何（甚至包括重新肯定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结论），一定对包括明史、清史在内的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使之向前迈出很大的一步。

2008 年 3 月 3 日于南开大学范孙楼

导 言

本书收录的论文分为五组,分别讨论明代中国社会历史中的国家制度、知识分子与社会结构、下层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货币与财政、历史大趋势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论文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逐渐积累的,前后跨越了20年的时间。其中,80年代中期发表的有6篇,90年代发表的两篇,2000年以来写作的及在90年代写作但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共有11篇,结论是汇编此集后作的,相当于对所选论文的总结。这样整理之后,除了两篇与别人合作发表的论文未收之外,我在明史领域所写的文章已经大致在此了。

现代历史学是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的,无论具体研究的领域如何,研究者总要有有一个或者几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在逐步澄清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过程中,对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也能够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我在明史研究中持续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明清历史的基本趋势。明代中国是一个有组织性的体系。与其他自组织体系一样,明代中国有自己的组织方式、运作机制和体系功能。逻辑上说,这种体系功能如果具有特殊性,就会包含特殊的潜在可能性,在具备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它的某些潜力可能充分展开,形成变动的趋势。1644年,明朝中央政府灭亡,东北边疆地区的清政权入主中原。这场转变造就了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如果该体系与明朝的并无重要差别,则明代的变动趋势会继续下去,否则,就会受新的运作机制影响,形成与明代不同的潜力和趋势。我的研究,重在明初和明末清初。研究明初的目的是了解明初所建立的国家、社会组织体系的特点,研究明末是为了考察这个体系的结局,并通过

结局来辨认出哪些变动应该被看作是重要的。关于清代,我关注的主要只是它与明代的差异,其意义也限于对一般趋势略有把握而已。即使仅就明史研究本身而言,我所做的这类研究范围也不宽,更不能覆盖所有实际上重要的方面。原因主要是学力不逮,而且常为其他关注所打断。次要的原因是,学术界的前辈对明代历史最具有重要性的问题大多有所研究,其中许多我们除了借鉴之外,其实不能提出更多的东西。所以,当我觉得应该开始对明代历史的基本趋势做出初步的综合性讨论的时候,我所依据的史实基础中只有一小部分,即本集所收论文所探讨的那些方面,是经过自己直接研究的结果,更多的是倚赖前人研究的成果。

当尝试将各方面的线索汇聚起来的时候,我强化了在 80 年代就已经形成的印象:明代中国的组织方式和势能具有一种独自的逻辑,它的运作,并不指向任何其他社会体系已经或者将要展开的去向。换句话说,明代中国的历史是自律的。如果的确如此,则我们考察明代历史趋势的基本方法论就要有所修正。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史学界思考明清时代历史趋势的基本方法论是资本主义发生学的范式。这个范式的前提是原发资本主义普遍性的假设,即各个国家、民族都会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假设。而该假设的依据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规律论。这种规律论长期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该理论的“经典”性已经受到严肃的质疑。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拙作《学史丛录》中的有关章节。^① 这意味着,关于中国明清之际历史趋势可以提出新的解释。50 年代以来,史学界主要依据资本主义发生学范式来分析明清历史趋势,将关注的焦点放到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充分成长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无论怎样去回答,都会落入一个逻辑陷阱:“资本主义在中国必然发生,但是却没有发生”,结果本身推翻了前提。无论理由如何,结果都还是推翻了必然发生这样的前提。因而,“为什么没有发生”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至少是一个缺乏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的发生是十分

① 赵铁峰:《学史丛录》,中华书局,2005 年版。

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则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就同样是十分复杂的。这些复杂因素中如果包含文化的和地理、生态条件的要素,则没有两个重要文化体系和地理、生态环境体系是相同的,原发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也就难以成立。如果我们把史学家们所提出的原因归结到一起,就会发现,并非个别因素,而是许多因素,无论从逻辑上说,还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说,都不可能存在于明清之际的中国。因而大多数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发地发展起资本主义的解释其实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走在与发生着资本主义的欧洲同样的道路上,而是在发生着另一种历史过程。研究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远不如研究究竟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发生那些事情更有意义。前者是把明清史当作“变态”来看,后者是将之当作正常态来看。从正常的意义上来审查明清时代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自律的历程。

关于明代历史的自律性这个大问题,还是留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来展开讨论。现在简要介绍一下作为正文的五个部分各自的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这些具体的题目与上面所说的大主题关系有远有近,但都与之相关。

第一部分的四篇文章讨论明朝国家制度,以洪武朝制度为主。明代的国家制度大多奠定于洪武时期。洪武以后,政策变动多,制度变动少;社会变动多,政府变动少。因而洪武时期建置的制度框架是理解明代中国的一个起点。明初制度包含唐、宋、元制度的许多因素,如《明律》仿照《唐律》,赋税制度仿照“两税法”,军制和行省制度继承了元代的许多特征,货币制度也是仿照宋、元制度设计的。但是明初制度并不是旧制度的简单重建或者复活,它有自己的纹理,有历史的新异性。元朝末年的制度崩溃形成了重新设计制度体系的机缘,获取君主权力的朱元璋将君主专制、官僚政治、农民均平社会理想、宗教多元主义混合起来,制定了明朝的国家体系。他寻求绝对的君主专制权威,把父家长的观念运用到国家制度中来,分封子弟为王,用家族权力制约官僚政治。严于治官,宽于治民。建立老人制度、粮长制度,形成受国家监督和支持的基层社会自治体系。老人可以直接对皇帝投诉官吏非法行为,以下制

上,体现一种专制皇权下的民主机制。粮长制度也是类似的一种制度,用非政府的或者准政府的社会机构来运作部分国家财政。搞土地所有权的调整,允许无田人家耕种原业主抛荒的土地,调整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迁徙浙西富户到濠州发展经济。通过鱼鳞图册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经济重建。小农经济是一种社会平等理想的体现,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础。通过黄册制度,使四民各安本业,辅以不许轻离乡里,不许轻易经商,不许年轻女子为尼,限制僧道数量等政策,实现社会稳定。通过科举、学校、荐举三途并用,对知识分子加以牢笼利用。对外则基本封闭,公布不征之国,以和平共处为原则,限制海外贸易。这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反映农民社会理想的社会结构图。明代社会的演变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展开的。这些基本制度,都有比较充分的研究。本书第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则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

《明太祖的国家宗教管理思想》对朱元璋宗教管理思想进行分析,以了解明代君主极权政治体制下国家宗教政策的观念基础,并为分析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做准备。明太祖宗教思想全以国家政治为着眼点,即从世俗的立场看待宗教问题,以政治的手段驾驭宗教,其思想仍以儒家国家政治理论为基础,为有明一代国家宗教政策奠定了以儒为本,以佛教、道教为用,为制度化的宗教留出一定空间而加以控制,对可能成为社会控制威胁的民间的其他有组织的宗教性活动加以限制的基本方略。此方略因出发于政治实用主义,其中有经有权,有诚有诈,其国家专制社会的倾向明显,但并非绝对化的专制,而是具有一定的弹性。就明太祖有生之年看,其宗教思想大致和国家宗教政策以及国家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保持协调。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考察,明太祖宗教政策并无明显的思想混乱或者举措矛盾处,他建立了在专制体制下实行宗教多元化的制度和政策。这种体系从上受到君主、贵族特权的破坏,从下又受到民间各类宗教泛滥的颠覆。明代后来的君主,不敢公开改变朱元璋的“祖制”,因而名义上制度不变,但却因循时事,不断地修改宗教政策,直至形成混乱的局面。到正统时期,释道数量开始失去控制,成化时期更成佛道人口大泛滥的时期。此时虽然社会经济、

文化继续发展,但宗教政策与民生的矛盾已经尖锐化。后来皇室崇寺院之修建,度牒失控,僧道流布天下,师巫邪术无涯无止。这种局面,一方面为民间文化增加了活跃的因素,另一方面则与其他变化一起,使明朝的秩序体系成为一个混沌。

《明初城隍祭祀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就洪武初年的城隍祭祀制度问题与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先生做一些商榷,其意义则在于澄清关于明初国家制度与社会关系的误解。^① 滨岛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考据性的论文,主张明朝初年的国家城隍祭祀制度与民间城隍信仰是对立的,因而从一开始就未能实行,而且围绕这个问题曾发生严肃的政治派系斗争。这与我关于明朝初年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解以及关于明初到明末的历史演变线索思路有很大的差异。在查对了滨岛先生所依据的文献之后,我认定他的结论并没有切实的根据。明初城隍祭祀制度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并非在两派斗争中产生,而且有关制度内容颇得实行,城隍信仰在明清时代的普遍化其实颇以明初政府注重城隍祭祀为基础,民间城隍信仰和祭祀方式后来的确与国家的祭祀方式有差别,但那不是明朝初年的情况。这篇论文的另一用意是表达对流行的迷信外国学者和知名学者言论倾向的异议。滨岛先生关于明代城隍祭祀的论文在国内多种刊物发表,内容相近,又有多种转载、引用。该说漏洞多有,何以从无人质疑?学术是一种创造性的事情,如果迷信名家、名著,就易生出种种搬弄权威,以愚世人的情状,人云亦云尚在其次。

《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寓意》尝试解释明朝国家祭祀制度和祭祀活动的实践含义。中国古代国家从来对祭祀活动极为重视,形成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祭祀规范。关于这种持久的现象,研究也已经很多,但研究的重点在于中国历史的前期,而且集中于文本解读。史学界其实没有就中古以后的国家祭祀活动究竟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对于社会又意味着什么这样很重要的问题,做出细致的

① 该文原发表于《求是学刊》2005年1期,原题目为“明初城隍祭祀制度: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说商榷”,收入此集时删去了副标题。

分析。明朝国家规定的祭祀对象是一个自然、祖先、先师、历代名王、英雄豪杰、大学问家、道德典范、有功于国家社稷或者地方社会者、个别民间信仰神、无家野鬼合成的群体。这些真实或者虚幻的对象混合而成的群体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权威和价值世界。“天”作为抽象的最高崇拜对象,体现人的精神世界中人、神本质的同一性。这意味着中国古典时代的人本主义世界观在明代国家理念中仍旧拥有稳固的地位。拥有具体名目、形象的诸神都被局限到与某些具体事物相关,因而是降格的或者是广义巫术化的。国家规定,与最高主神“天”以及普遍、最高等级的神的沟通只能由皇帝代表国家来进行,地方官祭祀与辖区有特殊关系的神,各类民人则祭祀与私人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神。这样,明代祭祀体系中包含的民本精神又是经过专制君主制度和行政等级体系筛分的,从而与民权、民主剥离开来。因为皇帝与天为中心的神直接沟通,所以皇帝与天、地、祖先、社稷以外的被祭祀对象之间并不是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而是尊重与被尊重的关系。诸神在祭祀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是根据他们对宇宙秩序、国民的贡献,这同时也是对皇帝事业的贡献,来确定的。所以,明代的国家公祀,是以有神论的形式实行的公共秩序规范演示活动,着眼点在于治民,是安排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明代的国家祭祀体系可以容纳多种门类的神,不必担心他们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信仰逻辑的冲突。明朝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变更主要来自佛教、道教成分向国家祭祀活动的渗入。求助于佛、道,规避了自己的主要责任,因而取消了天权崇拜体系下人必须随时反省,归根结底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获得福祉的意识,从而使政策调整的可能大为降低。士大夫中坚群体一直主张坚持明初制度原则,排斥佛教、道教的渗透。这种主张貌似保守,但在防止国家政治和管理体系泛宗教化的意义上毕竟更具合理性。明世宗近玄,明神宗近佛而又不勤祀典。这两个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把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实践意义扭曲而致废坏了,这意味着最高统治者政治理念和国家政治文化精神趋于混沌状态。经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明朝的祭祀制度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文化体系的缩影。这种政治文化体系源远流长而又代

有更新,明代中国文化的几分凝重在这里,若干流变在这里,许多冲突也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几篇论文远不能交代清楚,我已经拟定了一个扩展的研究计划,以做更彻底的探讨。

《票拟制度与明代政治》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的,意义在于理清明代内阁运作与明代政治体制性特征的关系。票拟制度是正统以后形成的中枢政治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其前提则是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造成的中枢政治真空。朱元璋为加强皇权专制而废除几千年间掌握国家中枢行政的丞相制度,把皇帝本人变成了身兼元首和行政首脑两个角色于一身的独夫,然而世袭皇帝不可能个个勤奋有为,终究还要有人代为处理大量政务。这时不设丞相的祖制又不能改变,到宣德、正统之际,终于通过改变皇帝顾问秘书集团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而形成了内阁制度。这是一种决策权与行政执行权之间通过中介来实现间接结合的体制,这个中介就是内阁。内阁由翰林文秘之职演变而来,阁臣如不兼部院长官,并无任何行政权力,主要职责就是票拟,即为皇帝起草文件、批复。内阁既设,文牍庶务得人而委之,皇帝得免“烦剧”之劳,恰好成其不亲政务,不近臣工,倚重“官奴”之习,宦官得以把持“批红”。明代政府中枢机构,缺乏切实的主持机构,遂形成宦官政治。明末思想家对于明代废丞相、行内阁制、票拟受制于批红,以致宦官干政严重等问题都有相当的认识,唯于票拟制度之形成、演变、运作程序并无专门讨论,且有一些流行的误解,所以有此文加以讨论,并在比较具体的层面来认识明代特有的内阁政治的功能性障碍。

第二部分“晚明知识分子与社会结构”包括四篇文章,都是考察晚明知识分子观念、行为、思想的。

《黄宗羲思想三议:读〈留书〉札记》是在80年代骆兆平先生发现《留书》并将之公布在《文献》上之后不久写的,应该是中外学术界关于《留书》的第一篇评论文章。^①在那之前,有一位史学同行根据章太炎关于黄宗羲有向清朝“上条陈”的用意的说法,断定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是打算献给清朝的,黄宗羲到清初已经没有民

① 刊于《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